当代红学六十年的历史回顾及展望

赵建忠

摘要:自1954年以来,当代红学经历了60年的社会历史批评、索隐、考证诸派的红学研究,诸学派各有其学术特征,且在红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也不同。上述研究流派不同程度地遮蔽了《红楼梦》的审美视域,其诠释维度有限,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回顾与反思。寻找红学的突破契机,展望期待视野中的学科前景,正是为了实现“红学”研究模式的转型与重新建构。

关键词:当代红学;历史回顾;诠释维度;学科前景

如果说《红楼梦》在一座座文学的崇山峻岭之间可比作珠穆朗玛峰的话,那么,这部伟著的作者无疑就是星汉灿烂的文学星空中最醒目的一颗。按照红学研究中的“癸未说”,今年恰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①,而被称为中华文化“全息图像”的《红楼梦》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为世人普遍关注。从红学流派发展史的角度看,《红楼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最重要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一是古典红学阶段,这个阶段以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经历为起步,包括他的亲密合作者脂砚斋在早期钞本上作的自赏型评语及程本面世后形成的导读型评点,还有探究《红楼梦》“真事”的索隐红学。称此为古典红学阶段的原因,是清代红学评点、索隐均是以文本为依托的传统解经模式。二是近、现代红学阶段,这个阶段从王国维引入西方哲学及文艺理论为《红楼梦》的评论树立新典范为起始,而胡适改造乾嘉学派建立的“新红学”成为这个阶段《红楼梦》研究模式的主流。三是当代红学阶段,这个阶段以1954年泛政治化语境下出现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取得正统地位为标志。2013年恰恰是毛泽东写下《关于〈红楼

梦〉研究问题的信》整整60周年,是当代红学的“甲子纪念”。无论红学史家对那场红学运动作何评价,有两点却是研究者相同的立场,即近、现代红学阶段与当代红学阶段是以1954年为分水岭的。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的那场运动无疑是红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以后的《红楼梦》研究甚至整个古典文学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拂去历史的烟云重新审视那场重大的红学运动,回顾当代红学60年的历史进程并进行学科走向的展望,对“红学”研究模式的转型与重新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继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第二次重大转型。如同伴随第一次重大社会转型中红学领域出现的新红学考证派与旧红学索隐派交锋对垒一样^[1],《红楼梦》研究方面由于“社会历史批评派”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拍,遂取代新、旧两派红学而成一枝独秀。1954年9月1日,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刊物发表了两个“小

收稿日期:2013-08-16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3BZ0035);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TJZW12-017)。

作者简介:赵建忠,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387)文学院教授,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①曹雪芹卒年除“癸未说”(1764年)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壬午说”(1763年)。“壬午说”的根据是:一、甲戌本脂批“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二、北京通州张家湾“曹雪芹墓石”上所镌刻的文字。但这两条证据颇受到持“癸未说”研究者的质疑,好在卒年争议与本文探讨的宏观问题关系不是很大,为行文方便,此处不拟枝蔓。

人物”李希凡、蓝翎与红学权威俞平伯先生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2]，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从而揭开了红学史上新的一页，《红楼梦》研究也就以此为标志进入了红学当代史研究阶段。当代红学内容丰富，有公认的学术成果，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总结尚不够，至今也没有出现一部《当代红学史》式的专著。不管那场划时代的红学运动有多少偏颇或不足，但有一点还是有其“合理内核”的，就是着重对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由“外学”转向“内学”，即“回归文本”。可以这样说，与1980年代以降红学的多次论战大都围绕着家世、版本等史料辨析不同，这场红学论争毕竟主要是围绕着《红楼梦》的思想性展开的。虽然由于它的“形而上学”立场和政治运动性质，不可能使思想性的探讨达到真正的准确和深刻，但对统治红学达30年之久的胡适考证派的批评却颇能击中要害。应该承认，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全新的价值判断，特别是那种新的治学方法，对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学研究流派——考证派独霸红坛的局面确实具有一举扭转乾坤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以“烦琐”来贬低“考证”的作用和价值，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寻找古典文学的阐释与史料之间天然联系义务，从而使“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来愈显示出后力不接。如果从吸取教训的角度看，“社会历史批评派”在红学研究中又过分看重《红楼梦》中的社会内容，《红楼梦》只是被当作一份记录一定历史时期的文本材料，这与从整体上把握作品，显然有着文艺与非文艺、实用与审美的本质区别。如翦伯赞的《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3]及邓拓的《论〈红楼梦〉的背景和历史意义》^[4]两篇文章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的文章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见解，发前人之未发；然而，由于受当时特殊时代背景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不足。

从中国学术史的渊源上考察，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与我国传统的侧重微言大义的“宋学派”一脉相承，也与“五四”以降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有关。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这种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如果离开历史、社会而仅仅从作品本身去寻找答案，人物形象也就变

得难于理解而流于随意性，这方面恰恰是“社会历史批评派”对“考证派”的可贵反拨。胡适所开办的“新红学”研究模式仅强调“作者”与“版本”两项；对“时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当然，作为中华文化的“全息图像”，《红楼梦》又不仅仅是写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考察，社会历史批评派对《红楼梦》的诠释维度就有限，因为它不能穷尽《红楼梦》的全部。还应该看到，社会学诠释的维度仅限于物质态文化，对形而上的“精神态文化”挖掘不够深入。依照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水面的冰山只要不一叶障目，谁都能看得见，但水面下的冰体恐怕是水上冰山体积的若干倍。《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就犹如海洋中的冰山，目光可及之处，已经让人们高山仰止，但目光不可及之处，还可能蕴藏着更大的能量。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由于只侧重社会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考察，这就不但矫枉过正，遮蔽了《红楼梦》艺术赏鉴的审美视域，而且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也必然会导致学术品格的失落。尽管对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新政权建立以后对意识形态进行整合的需要，并对当时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学术问题采取政治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就容易流于“粗暴”，更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如果说要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话，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应该是首先要反思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还涉及到文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1954年的《红楼梦》批判运动之后，围绕着红学思想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是对“市民说”的质疑。“市民说”的核心论点是：曹雪芹作为“新兴市民”的代表写了一部“市民文学”作品，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新人的萌芽”。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用“市民说”解释清初的思想家和《红楼梦》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因此，他提出了“典型共名说”^[5]（代序，P1），后来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又把“共名说”发展成“共感说”^[6]（P12），这就形成了与社会历史批评派“典型论”的争鸣。其实，正像有人指出的，“共名说”与其说“在建设性方面有理论意义，毋宁说在拦阻渐渐上涨的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主义论的思潮上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7]。

19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

红楼梦》研究,基本上逸出了学术范围而成了政治的婢女,操作方式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红楼梦》中的人和事。如视第四回为全书总纲,将贾政类比为孔老二,又将贾宝玉、林黛玉简单说成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视薛宝钗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等,并据此批判了俞平伯先生的“钗黛合一”论以及曹雪芹世界观的局限性等;也有研究者对这段红学历史持保留看法。如刘梦溪《红学三十年》一文就代表了另一种倾向,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红楼梦》在那特殊的时代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8]其实,这是皮相之见。《红楼梦》的普及与对《红楼梦》内在价值的真正学术性的认知完全是两回事,遥想当年的“评红”运动,确实曾震撼朝野上下,席卷大江南北,一方面让《红楼梦》普及到街谈巷议的程度,使红学在古典文学中独占鳌头且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其专学意义和学术价值也随之减弱,《红楼梦》研究在通俗化的同时也变得日益庸俗化。由于《红楼梦》中蕴含着异端性、反叛性和超前性,而这种思想向度其实具有某种“革命”意味,这就和革命领袖的思想碰撞出火花甚至某些方面还深度契合,造成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他学俱废、红学及鲁迅研究畸形繁荣的局面。当时,称《红楼梦》研究为“显学”并不为过,但学术研究应该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而达到客观认知而非外力所加,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学术教训。

二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的第三次重大转型。由于摆脱了以往政治功利观念的思维定势,红学研究更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自体。这一个时期的《红楼梦》研究表现出集团性和组织性。1980年,《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先后成立,专门的《红楼梦》研究刊物《红楼梦学刊》创刊。从那时起的30多年来,红学界发生过多次数较大的学术论争,但基本上属于文献的发现、考证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关于河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陆厚信绘“雪芹小像”的真伪的争论,曹雪芹香山“故居”的争论,张家湾曹雪芹“墓石”真伪的争论,关于脂批本真伪的争论等,其中关于《红楼梦》“原始作者”和曹雪芹祖籍的争论最为激烈和持久。戴不凡的长文《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引起了红学界广泛注意。

他在文章中指出:曹雪芹只是《红楼梦》的“改作者”,原始作者是“石兄”,他写的书原名为《风月宝鉴》,曹雪芹是在这部旧稿的基础上巧手新裁而改作成书的。[9]针对戴不凡的观点,《北方论丛》、《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文艺研究》等刊物连续发表了近30篇商榷文章;而在曹雪芹祖籍方面,则形成了“丰润说”与“辽阳说”的长期对峙。“丰润说”的主要根据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的后代有居住在江西武阳渡者,明永乐年间有一支迁到河北丰润咸宁里,不久又有一支从丰润移居辽东铁岭;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康熙年间做官的丰润县咸宁里人曹钤、曹铨交往密切,在与他们的唱和诗中有颇多表示亲族关系的语句。但“辽阳说”则坚持认为,曹雪芹的上祖与五庆堂的上祖为同一始祖。这些争论的产生,是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厌倦了“政治红学”转而将精力投注于纯学术上的结果,把问题推向了一个更深层的层次,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扩大了《红楼梦》的社会影响。当然,这些争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距离《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日渐遥远,以至于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其实,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早已对这种红学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他的有关论述对于纠正考证派红学的末流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其观点也有不少可议之处。最根本的失误,是对红学考证工作的难度及其重要性估计不足。他讥讽“红学”蜕变成“曹学”,其臧否倾向,已尽含其中了。[10]诚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红楼梦》仅仅是曹家或清代历史的谱牒记录,但我们也很难设想,一个对清代历史、对作者生平一无所知的读者,会对《红楼梦》的理解把握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指出某些考证对红学研究有没有用,有没有效,但却不能指责红学考证本身。

周汝昌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中,不仅维护考证派红学的重要地位,还特别强调了红学研究的范围只包括“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四个分支[11],但也有人将上述内容视为“红外线”而颇有微词,认为真正的“红学”应是用小说的观点去研究《红楼梦》“本身”,即通过分析小说的内在结构,将作家的“本意”发掘出来的学问,两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就争论双方的逻辑归宿来说,后者能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同情,是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考证派特别是考证曹雪芹远祖的文章汗牛充栋,不少文章用力虽勤,却存在着琐屑、苍白的

流弊,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甚至一字之辨,使得许多重大的红学现象往往有意无意地被置于脑后。当然,关于红学定位的论争,也使得考证红学的几个分支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探佚学”从倡导到最终建立,并对以后《红楼梦》电视剧的拍摄产生了重要影响。探佚派对《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辨析方面具有其他红学流派不可替代的优势,但这一派也有一个通弊,就是价值取向、参照系上表现为“一维性”,即“凡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脂批提到的情节就视为写得好的文字,对后四十回中有可能掺杂了曹雪芹笔墨的文字就不去爬梳,甚至写得好的文字也不肯正视,从而弊于一曲而失其正求。尤其是抓住脂批和前八十回有关谜语、诗词的只言片语就想入非非地去探索《红楼梦》后半部的情节,用主观想象去代替客观实证,势必会走到探佚派创立之初要“还原曹雪芹原著真面”的反面。与此相联系,再以考证派中的版本和成书过程研究来说,这本该是红学研究中最基础的史料还原,而真正把《红楼梦》原始文字的源流演变的脉络梳理清楚,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有的研究成书过程的学者仅仅根据尚未露出庐山真面的《风月宝鉴》,以及抓住《红楼梦》中某些独特的语言现象就不加节制地猜想,不但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度,而且还有把曹雪芹呕心沥血、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解构为粗糙毛坯之嫌。

与考证派红学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热点”相对应,索隐派红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先是名噪一时的霍氏姊弟出版了《红楼解梦》,其索隐结论是“曹雪芹毒杀雍正帝”,继而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的系列讲座,引发了新一轮“红学热”。当然,他提出的“秦学”并声称是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也引起了红学界的批评。本来,索隐派想发掘作品的微言大义,尤其是在制约文本释义的发散性方面,出发点好的,因而有其合理的因素。进一步讲,中国文学讲究意在言外,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更容易容纳象征意象,何况《红楼梦》的包孕又是那么丰厚。《桃花扇》尚且能“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红楼梦》为什么就不能有所寄托或不允许去索解作者的婉曲隐衷?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认为,“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

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谭;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12]。不能说这种看法毫无道理,问题在于如何具体看待《红楼梦》里的人和事,索隐派的致命弱点是求之过深,使得那些本来有些道理的东西也弄得不能自圆其说,特别是索隐派的重大毛病在于它非要在文本意义的诠释领域中进行“史料还原”,以为这样的“还原”才算解读了《红楼梦》。其实,不管《红楼梦》里存在着多少真实历史信息,而这些信息一旦进入小说艺术整体中,它们就已经被天才的作家整合,从而被构造成新的意义单元。由于索隐派这种理论上的先天不足,自然挡不住科学的红学新理论的摧陷廓清。今天,索隐派早已失去了当年那种“反满”时代风潮的支撑,即使有市场经济下媒体的炒作,这种“文史合一”的研究模式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力量去推动当代红学的发展。

三

红学流派都有各自的源流谱系,无论是较为注重史料钩沉的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评派,就其根源上讲,它们与中国传统经学史上的“西汉今文学派”、“东汉古文学派”、“宋学派”一脉相承。当然,这样的描述也还只是线性描述,人文科学中的某些现象往往呈现着非线性的嬗变,学术流派的嬗变沿革还有更为深刻的时代价值观念、集体无意识的影响渗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为了全面了解红学各个流派的特征,从而使多视角的研究具有某种互推性和互补性,因为研究方法总是在对峙、摇摆、反拨中发展的。新时期以来,从学术史的角度科学地总结红学的渊源流变、学科特点的红学史专著应需而生,但不外乎以红学历史分期为本位、以红学人物为本位、以红学方法论为本位和以国别红学为本位等几大类别,体例不一,论述侧重点有异,都从各自的视角总结了其视野所及之红学,不过多少也都出现了由材料和方法所带来的缺陷及盲点。红学史的不同写法还不仅是一种写作策略,不同红学史模式的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和思路,红学史也可以理解成历史记忆的重新诠释或再度重构,终极目标还是追寻红学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对于那些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其原典精神仍扎根于现代人文化心理结构的红学流派,应努力去寻找传统与现代沟通的衔接点,对传统红

学流派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用现代学术视野去观照,也就是充分注意到红学史的当代阐释性。通过对红学史盲点的探索而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应该属于红学史的“推进型”研究,而这正符合学术史的发展趋势。

应该指出的是,红学研究中的不同流派对《红楼梦》的解读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其他流派无法完全替代;但同时,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尽管这些偏差又能被其他流派所补救。正因如此,研究者从不同的价值尺度、评判标准出发,往往就会造成对同一红学现象褒贬悬殊、抑扬失实的情状。其实,简单地指出某些红学流派的长处与缺陷,还仅是停留在浅表的研究层面上,更重

要的是应在不同学派的影响与反影响、渗透与反渗透中寻求突破的契机。真理总是相对的,没有颠扑不破的绝对,只有无限接近的可能。不同观点之间的探讨、争论、确认、推翻、重构,才是接近真理的必经之路。在文化开放、价值多元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就学科走向而言,红学研究也应该是多元吸纳后的融通、贯穿和整合。应该看到,“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如何开辟新的方向,是红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回顾当代红学 60 年的历史进程并进行学科走向的展望,正是为了实现“红学”研究模式的转型与重新建构。

参考文献:

- [1] 赵建忠.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评范式的转换[J]. 文艺研究, 2006(2).
- [2] 李希凡, 蓝翎.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J]. 文史哲, 1954(5).
- [3] 翦伯赞. 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J]. 北京大学学报, 1955(2).
- [4] 邓拓. 论《红楼梦》的背景和历史意义[N]. 人民日报, 1955-01-09.
- [5] 曹雪芹. 红楼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6] 蒋和森. 红楼梦论稿[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7] 胡明. “红学”四十年[J]. 文学评论, 1989(1).
- [8] 刘梦溪. 红学三十年[J]. 文学研究, 1980(3).
- [9] 戴不凡. 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J]. 北方论丛, 1979(1).
- [10] 余英时.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 [11] 周汝昌. 什么是红学[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982(3).
- [12] 王梦阮, 沈瓶庵. 红楼梦索隐[J]. 中华小说界, 1914(6).

Retrospect of Sixty-Year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its Research Prospe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AO Jianzh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gives us some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n the sixty-year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ince 1954 in modern China, it analyzes the academic features of such schools a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proper guess, and textual research. The author thinks that such paradigms cover the aesthetic factors of the novel to some extent, leading to limitations of their explanation. Then the author also emphasizes their roles in the history of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having an expectation to the breakthrough opportunity and prospect of the subject, to achieve the research mode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istory; degree of explanation; prospects of the subject